

樂也陶陶

范曾寄意紫砂



樂也陶陶

—— 范曾寄意紫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也陶陶:范曾寄意紫砂 / 徐斗编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8.1
 ISBN 978-7-108-02753-5

I. 乐... II. 徐... III. ①紫砂陶-陶瓷茶具-工艺美术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汉字-书法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中国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J527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0445 号

乐也陶陶——范曾寄意紫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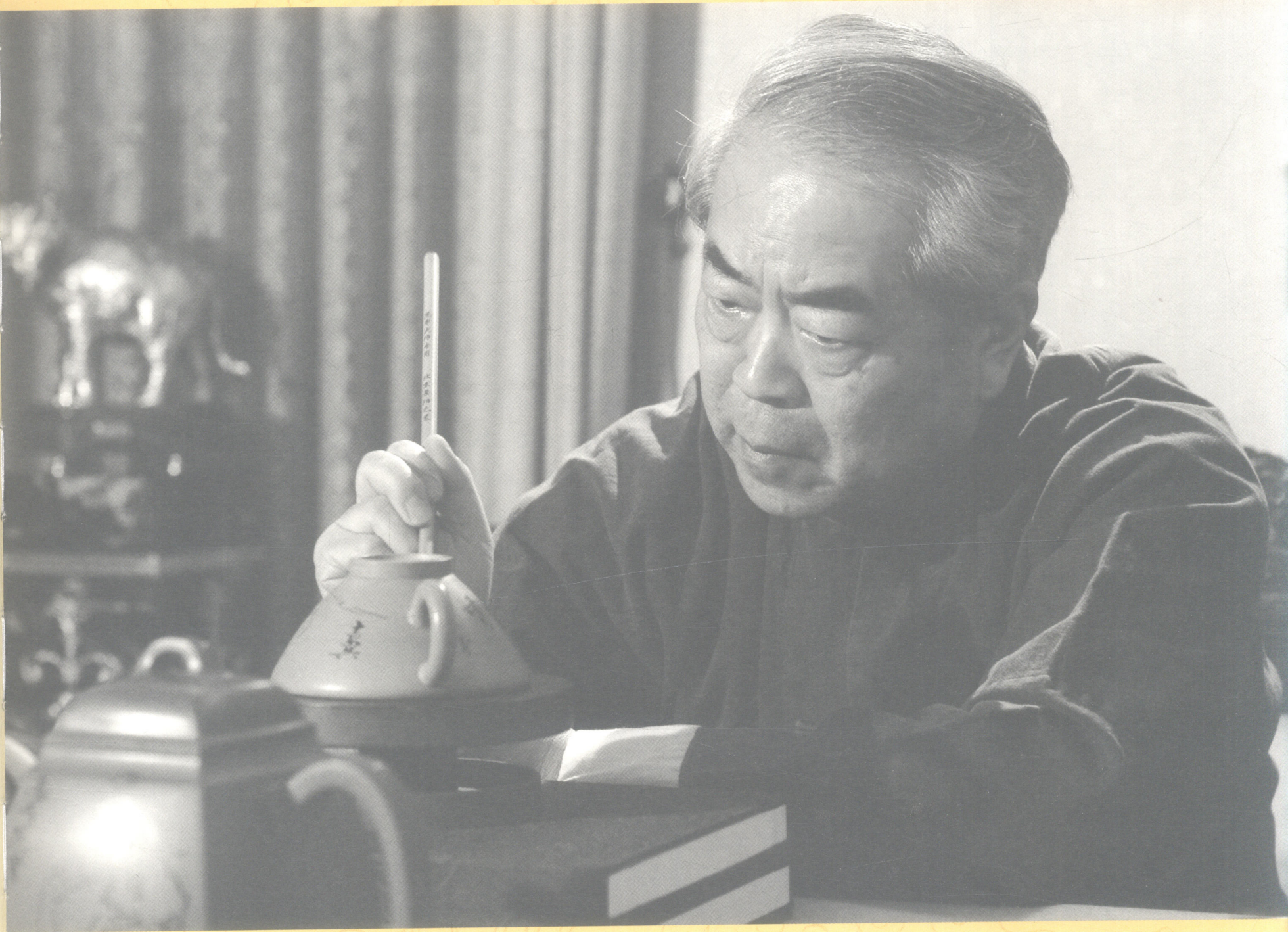
编 者 徐 斗
 责任编辑 张 荷
 美术指导 海 洋
 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 邮 编 100010
 经 销 新华书店
 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 印 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 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8 35.75 印张
 字 数 30 千字
 印 数 0,001—2,000 册
 书 号 ISBN 978-7-108-02753-5
 定 价 680.00 元

陶 艺 李昌鸿 沈遽华 毛国强 凌锡苟
 倪顺生 曹亚麟 蒋新安 桑黎兵
 陈洪平 李 伟 范顺君 吴 勇
 文 案 郭长虹
 策 划 学 周
 统 筹 薛晓源 邹玉利
 联 络 杨国华
 摄 影 王书灵 周 伟
 监 制 饮兰山房

《乐也陶陶》载入中国宜兴紫砂博物馆、
 中国收藏家协会紫砂艺术委员会大事记

便覺長生
碧玉葉藏古今
大賦
題山房藏壺

幽情
都歸自在
陶壺有天地
丁亥年范曾寒碧聯語





题 语

徐君持示范子画壶一编，请加月旦道其归宿。读之既竟，聊贡数语：古贤于方便门证无上道，以游戏法出真实相，故小叩大鸣，微物足乐，使滞解而神亨，则事纤而道富。今赏兹编，余亦云然。陶师巧制，画师戏笔，在俗谛为末技，而范子以无差别智观之，故能寓意陶情、因物绘理，恢恢然游刃而熙熙然气融。览其挥运，无方无至；味其风调，随转随安。而循体以触机，因宜以生变，畅不测之神，写独得之乐，亦足与道有取焉。问“道”何如？“道”或如“乐”，故孔子屡言“乐”，曰“乐在其中”；曰“不改其乐”；曰“乐以忘忧”；曰“不亦乐乎”。在昔苏轼广其意曰：“吾安往而不乐”，又曰：“世之所乐，吾亦乐之。”而范子今又嗣其响，则曰：“吾为乐而生，吾乐根于道。”是皆可征道无异同，乐无高下，道乐交流，等如善水，观其滔滔之象，即得陶陶之乐。而范子涵养心源，亦复流用不尽矣。

徐君，范子门下士，好古博通，仰高善悟。以与范子心思未远，盛推其人乐且有道，故命此编曰《乐也陶陶》，亦所以演刘伶之酒德提茶德义也。嘉名丰义，可味可佩，余即服善附声，借题发挥云耳。

寒碧拜题 丁亥重三

茶聖品茗圖
歲次壬寅
北冲
范曾



清明矩度是文心

——论文人在紫砂艺术史上的作用

郭长虹

本册所收之紫砂作品，是范曾先生与当今宜兴紫砂名工联袂所作。就书画而言，范先生名扬于当今画坛；以壶艺而论，则本册所载，皆当今之大作手，从制壶到刻工，均极一时之选，洵壶史之盛事也。盖紫砂自明万历间流布天下，数百年中杰出之名工，如时大彬、陈鸣远、杨彭年等间有特出，各领风骚；为之添一段文雅风流之文人韵士亦复不少，然王世贞、陈继儒坐而论道，指点壶师，并不直接参与创作；陈曼生从壶式到铭文皆有参与，是紫砂之大功臣，惜雅趣虽多饶，格局似嫌小；吴大澂亦金石名家，能铭而不能画；以当世一流之书画大师兼诗人，而如此从事壶艺创造者，范先生是其人欤。此事于紫砂壶史，真可大书特书者。

以紫砂器为纸进行书画创作，于书艺、画艺或不无微损，然奏之以刀，又别饶趣味；对于壶而言，则平添一段文风雅韵。因此书画家虽偶一为之，则有功于此道斯大。今雅好此道之藏家，往往独重器之工巧，此亦因世事之迁移，欲更求一文雅风流之陈曼生而难以得。故范先生此举，不惟是其书画生涯之一雅事，于紫砂事业之真正复兴功莫大焉。有鉴于此，本文不揣谫陋，列述历史上文人对紫砂艺术的贡



献，以期辨明原始，阐发其意。

紫砂壶在中国陶瓷史和物质文化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，以一器之微，不仅耗尽历代才人智士、名工巧匠的移山心力，更是价等黄金，珍同鼎鼐，耸动上至天子下至公卿士大夫，数百年啧啧人口者。

按工艺史上鬼斧神工之作在所多有，即以紫砂壶产生之日而言，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云：“近日一技之长，如雕竹则濮仲谦，螺甸则姜千里，嘉兴铜炉则张鸣岐，宜兴泥壶则时大彬，浮梁流霞盏则吴十九（号壶隐道人），江宁扇则伊莘野、仰侍川，装潢书画则庄希叔，皆知名海内。如陶南村所记朱碧山制银器之类。所谓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欤？”上述的“一技之长”，尤其以紫砂壶显得“郁郁乎文哉”，好像特别地得到传统文人的赞赏。

那么紫砂壶的“必有可观”之“道”在何处？从工艺美术发展史的角度，论列历代名工的杰出贡献、探讨壶艺的设计制作史、详细品味壶艺的形、神、气诸方面的美学追求，都不失为研究的途径，且经学者和工艺名家的努力，这些方面的成果也很丰富。本文则着重探讨在紫砂壶史上的文人们，和他们的文化趣味，对这一特殊工艺作品的影响。

一、茶事与文事

宋皇祐二年(1050)十一月，蔡襄罢福建转运使，召还汴京修起居注，遂自福建经杭州，北上汴京。在离开杭州的时候，他给朋友冯京(当世)留了一通手札：“襄得足下书，极思咏之怀。在杭留两月，今方得出关，历赏剧醉，不可胜计，亦一春之盛事也。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，此固可乐。唐侯言：王白今岁为游闽所胜，大可怪也。初夏时景清和，愿君侯自寿为佳。襄顿首。通理当世足下。大饼极珍物，青瓿微粗。临行匆匆致意，不周悉。”这通名为《思咏帖》的书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，通过此札，我们能够想见当时文人雅士诗酒流连、佳茗美器相赠的韵事。



蔡襄，是一位茶专家，于转运使任上，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《茶录》。这部茶学专著问世，据蔡襄自己说，是因为“昔陆羽茶经，不第建安之品；丁谓茶图，独论采造之本，至于烹试，曾未有闻”。因而向皇帝上书细论品茶之道的。《茶录》分上、下篇，上篇论茶，下篇论茶器，有茶焙、茶笼、砧椎、茶铃、茶碾、茶罗、茶盏、茶匙、汤瓶之属。而蔡襄临行赠送冯京的礼物，就是茶和茶具。

茶是中国文人的尤物。而茶具，自然也就成了书斋中的佳玩，不仅可以自用，也是馈赠的上品。

晋杜育的《荈赋》，已提到了茶具：“器择陶简，出自东隅；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刘。”陶之用以为茶具，其来尚矣。

关于饮茶的起源，众说不一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卷七“茶”条：“檟之苦茶，不见于《诗》、《礼》。而王褒《僮约》云：‘武都买茶’；张载《登成都白菟楼诗》云：‘芳茶冠六清’；孙楚诗云：‘姜桂茶荈出巴蜀’；《本草衍义》：‘晋温峤上表，贡茶千斤，茗三百斤。’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。”他在详细考证了《诗经》和《尔雅》中的“茶”乃是苦菜、茅荬之后，得此结论。此条也最为人常称引。唐陆羽《茶经》“六之饮”则云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”按“秦后始有茗饮”与“发乎神农”，本不相矛盾，但蜀人究竟何时开始饮茶，在秦并巴蜀之前，典籍无存，阙疑可也。

降自魏晋，则《三国志》中有以茶代酒之故事，《世说新语》有“水厄”之典故，唐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：“茶古不闻食之，近晋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煮，是为茗粥；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稍稍有茶，至德、大历遂多，建中以后盛矣。”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：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，大兴禅教。学禅，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；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，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。”

宋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亦云：“茶之尚，盖自唐人始，至本朝为盛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，益穷极新出，而无以加矣。”唐宋两代，是茶事大盛的时期。



唐代出现了茶史上的划时代人物——茶圣陆羽。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：“著经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备，天下益知饮茶矣。”本传所谓经三篇，就是著名的《茶经》。陆羽著述颇多，《全唐文》载《陆文学自传》曾自述其历史地理等著作，惜乎今已亡佚，惟《茶经》今日最著。

可以说，陆羽是第一个将饮茶这一人伦日用的事情人文化了的中国文人。《茶经》对当时的饮茶风气盛行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《茶经》“十之图”劝人将他的著作“以绢素或四幅、或六幅分布写之，陈诸座隅，则茶之源、之具、之造、之器、之煮、之饮、之事、之出、之略，目击而存，于是《茶经》之始终备焉”。至此，饮茶已经不是一件和油盐酱醋等同的开门七件事，而是“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的精致的文化活动的了。

《唐国史补》载：“巩县陶者，多为瓷偶人，号陆鸿渐，买数十茶器，得一鸿渐。市人沾茗不利，辄灌注之。”——陆羽的影响有如此之大。

《茶经》对于茶具有精细的论述，“四之器”记载了饮茶所用的二十四种器具，并对其优劣进行了详细的评判，如“越州瓷、丘瓷皆青，青则益茶，茶作红白之色。邢州瓷白，茶色红；寿州瓷黄，茶色紫；洪州瓷褐，茶色黑；悉不宜茶。”这可以看作最早关于茶具选择的趣味标准论述。今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，就是陆羽认为最好的越州瓷的最精者。

由于陆羽的提倡，茶开始“慕诗客、爱僧家”，逐渐地走入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来，从此在中国文人的书斋中，须臾不离。唐刘贞亮总结茶之“十德”，除了尝滋味、养身体、养生气、散闷气等食用功效外，还指出它可以有利礼仁、表敬意的社交功能，和可雅心、可行道的精神作用。唐朝的另一本茶书《茶述》云：“其性精清，其味浩洁，其用涤烦，其功致和，参百品而不混，越众饮而独高”，则因其清、洁、和、静的特征，茶不仅是一款日常饮品，更是高洁心灵的象征和表达物。

和陆羽大约同时代的李白，写了较早的一首茶诗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山仙人掌茶》。序云：“余闻荆州玉泉寺……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，枝叶如碧玉。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。年八十余岁，颜色如桃李。而此茗清香滑熟，异于他者。所以能还童振枯，扶人寿也。余游金陵，见宗侄僧中孚，示余茶数十片。拳然重叠，其状如手，号为仙人掌茶。盖新出乎玉泉之



山，旷古未覩，因持之见遗，兼赠诗，要余答之，遂有此作。后之高僧大隐，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。”在李白看来，族侄所赠送的“仙人掌茶”，“根柯洒芳津，采服润肌骨”，简直是神奇的不老之药。

而诗僧皎然，则写下众多的茶事诗，如《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》：“九日山僧院，东篱菊也黄。俗人多泛酒，谁解助茶香。”陆羽上元初在吴兴苕溪结庐隐居，遂与皎然结交，皎然在重阳节赋此诗，记赏菊、品茶の雅事。

酒在阮籍、刘伶、陶潜那里，登上了文学的舞台，现在，要面对一位淡雅清和的竞争者了。范曾先生曾云酒“以水为形、以火为性”，平静的外表下是如火的性情，恰如中国士人炽热的内心，故嵇康借酒作穷途之哭、阮籍以酒避司马氏婚姻之约、陶渊明得酒便如羲皇上人、李白得酒则百篇珠玑；而茶，则以土为母，以木为形，以水为友，遇金而生，遇火而成，甘苦其味，清淡其性，平和中有丰富无限哲思，枯淡里蕴山泽云雾之气，它与酒恰成一文一武，代表了文人情怀的两极。皎然诗中打起的茶酒公案，恐怕是对美酒与佳茗同样酷爱的李白所不能首肯的。但皎然却是爱茶之情弥坚，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云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来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愁看毕卓瓮间夜，笑向陶潜篱下时。”不仅辩难不休，还要广邀同好，《顾渚行寄裴方舟》：“我有云泉邻渚山，山中茶事颇相关。……清冷真人待子元，贮此芳香思何极。”《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困寄元居士晟》：“喜见幽人会，初开野客茶。……知君在天目，此意日无涯。”

白居易被贬谪江州司马，于元和十三年收到忠州刺史李景俭所寄新茶，作《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》：“故园周匝向交亲，新茗分张及病身。红纸一封书后信，绿芽十片火前春。汤添勺水煎鱼眼，末下刀圭搅曲尘。不寄他人先寄我，应缘我是别茶人。”

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诗这样赞美：“一碗喉吻润；二碗破孤闷；三碗搜枯肠，惟 有文字五千卷；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清；六碗通仙灵；七碗吃



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

元稹的《一字至七字茶诗》则广为人称道：“茶。香叶，嫩芽。慕诗客，爱僧家。碾雕白玉，罗织红纱。铤煎黄蕊色，碗转曲尘花。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对朝霞。洗尽古今人不倦，将至醉后岂堪夸。”

从唐代开始，几乎每个时期的文坛巨匠，都对茶情有独钟，苏东坡有“佳茗似佳人”的慨叹，而作《叶嘉传》；黄庭坚有“不游轩石之华胥，则化庄周之蝴蝶”的快意；徐文长有“倾七碗，对三人，须臾梅影上冰轮”的良辰……这样的名单，我们可以开得很长，几乎等同于开列中国文化史上的所有著名的名字。

二、明代文人文化趣味与饮茶风尚的变迁

前文所述蔡襄赠送冯京的“大饼”，即宋代流行的团茶。团茶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，最精美者甚至值几十万钱。宋徽宗所作《大观茶录》，对龙团凤饼论述颇详，当时的斗茶风尚，也曾经风靡一时，惟本文不是论茶史，故阙而不述。

《明会典》：“洪武二十四年九月，诏建中发贡上贡茶，罢造龙团，听茶户惟采茶芽以进，有司勿与。天下茶额，惟建宁为上，其品有四：曰探春、先书、次春、紫笋。”这是茶史上一次重大的变化，从此，延续了几百年的团茶、饼茶风尚逐渐消退，团茶、饼茶逐渐成为边贸互市的特有品种，散茶开始成为主流。相应地，饮茶器具也发生了变化。

洪武二十四年罢造龙团诏，不完全是朱元璋爱惜民力的举措导致的，自有其社会消费习惯的变迁。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著《茶谱》，对唐宋团茶的品评是：“羽多尚奇古，制之为末，以膏为饼。至仁宗时，而立龙团、凤团、月团之名，杂以诸香，饰以金彩，不无夺其真味。然天地生物，各遂其性，莫若茶叶，烹而啜之，以遂其自然之性也。”对“自然之性”

的追求，对“真味”的新兴爱好，是饮茶方式转变的内在社会原因。散茶早已出现，但不是饮用的主流，元代虽然一般社会大众开始普遍饮用散茶，但龙团仍旧是贡奉珍品，一般的认识，仍旧认为团茶的品格高于散茶。

据茶史学者研究，宋朝时，散茶的名目只有日铸、双井和顾渚等几种，而黄一正在《事物绀珠》中所记明时著名散茶，已得九十多种。而且大多数是第一次出现的新茶名，在明代万历以前的一二百年间，散茶的品种大量出现，表明它已经成为用茶的主流。

因此，朱权的《茶谱》称“予故取烹茶之法，末茶之具。崇新改易，自成一家”。——在饮茶习尚的转变时刻，又是一位文人，对新时尚赋予了人文意义。

明代的文人是入世的。这种入世当然和儒家一贯倡导的不离人伦日用有着直接的关系，但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，明代的文学艺术整体呈现着一种“俗化”倾向，即如“三言二拍”之类小说的大量传布、文人热衷于写作传奇、书画家的商品化倾向等等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。

但是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有意味的现象，即入世的行为，往往用出世的方式来行事，最典型者莫过于所谓的山人。这种山人，既不隐居山林，又不高尚其事，而是凭借一两种技艺奔走于公卿之门，打秋风、夹箴片。清人蒋士铨笔下的陈继儒，可谓刻画入木三分：“妆点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风雅小名家。终南捷径无心走，处士虚声尽力夸。獭祭诗书充著作，蝇营钟鼎润烟霞。翩然一只云间鹤，飞去飞来宰相衙。”按蒋氏之诗不免刻薄，虽然山人遭到整个社会的反感，甚至万历朝还出现了“恩诏逐山人”的政府驱赶行动，但正说明，在科举制度的压迫下，出处无路的下层士人的焦虑心理状态。

上述陈继儒在年轻时即裂衣冠，弃科名，便是一个典型事例。

这种心态反映在日常生活中，便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一方面，明代士人愿意沉浸在具体的一事一物的小趣味中，这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则愿意将固有的文化趣味带入具体的事物中，为这些“什物”进行“雅化”的文化赋值。也就是说，日常



生活的浮华化，是以精致化的方式完成的。

如果说唐代的文人饮茶，其意趣尚不离禅家况味，宋人斗茶，已涉富贵气息，则明人之饮茶，却一定要强调茶品和人品的一致性：“煎茶非漫浪，要须人品与茶相得。往传于高流隐逸，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。”^①我们可以在徐渭的传世作品《煎茶七类》中，明显地看到这种固执的坚持：“煎茶七类：一、人品。煎茶虽微清小雅，然要领其人与茶品相得，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、云霞泉石之辈、鱼虾麋鹿之俦。二、品泉。山水为上，江水次之、井水又次之。并贵汲多，又贵旋汲，汲多水活，味倍清新，汲久贮陈，味减鲜冽。三、烹点。烹用活火，候汤眼鳞鳞起，沫浮鼓泛，投茗器中，初入汤少许，候汤茗相浹却复满注。顷间，云脚渐开，浮花浮面，味奏全功矣。盖古茶用碾屑团饼，味则易出，今叶茶是尚，骤则味亏，过熟则味昏底滞。四、尝茶。先涤漱，既乃徐啜，甘津潮舌，孤清自萦，设杂以他果，香、味俱夺。五、茶宜。凉台静室，明窗曲几，僧寮、道院，松风竹月，晏坐行吟，清谭把卷。六、茶侣。翰卿墨客，缙流羽士，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，超然世味也。七、茶勋。除烦雪滞，涤醒破疾，谭渴书倦，此际策勋，不减凌烟。”

不仅茶，一切的日用什物，都不免被这种“雅化”的努力所覆盖，沈德潜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载的当时人好尚，像新安墨、云南雕漆、刻竹扇等等，往往成为非常时髦的玩意，如竹扇：“往时名手，有马勋、马福、刘永晖之属，其值数铢。近年则有沈少楼、柳玉台，价遂至一金，而蒋苏台同时，尤称绝技，一柄至直三四金，冶儿争购”，又如：“玩好之物，以古为贵。惟本朝则不然，永乐之剔红，宣德之铜，成化之窑，其价遂与古敌。”

这种“时玩”（与古玩相对）“始于一二雅人，赏识摩挲，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，波靡于新安耳食。诸大估曰千曰百，动辄倾橐相酬”^②，起初不过因为某种物品“其精雅则宜士人”，继而成

① 明陆树声《茶寮记》

② 《万历野获编》



为波及整个社会的风气，巨商大贾纵横其间，更使得“时玩”身价增重。

所谓的雅趣、幽趣，其总的倾向是清润温雅、平和怡然。简洁精雅的入世方式，不离人伦日用的儒教原则，加之主流艺术风气的影响——当时主绘画坛的松江派首领董其昌，就是“平淡天真”风格的最高倡导者。我们不妨摘录董其昌的朋友、山人的代表陈继儒的一些言论，来看这种趣味的总体倾向：

净几明窗，一轴画，一囊琴，一只鹤，一瓯茶，一炉香，一部法帖，小园幽径，几丛花，几群鸟，几区亭，几拳石，几池水，几片闲云。

香令人幽，酒令人远，茶令人爽，琴令人寂，棋令人闲，剑令人侠，杖令人轻，尘令人雅，月令人清，竹令人冷，花令人韵，石令人隽，雪令人旷，僧令人谈，蒲团令人野，美人令人怜，山水令人奇，书史令人博，金石鼎彝令人古。

文房供具，藉以快目适玩，铺叠如市，颇损雅趣，其点缀之法，罗罗清疏，方能得致。

吾斋之中，不尚虚礼，凡入此斋，均为知己。随分款留，忘形笑语，不言是非，不侈荣利，闲谈古今，静玩山水，清茶好酒，以适幽趣，臭味之交，如斯而已。^①

幽、远、爽、寂、清、冷、闲、简、旷等词汇，是最经常用来形容这种趣味的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紫砂壶出现在工艺美术的历史舞台上。

^① 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